

書 評^{**}

林 欣 儀^{*}

Jinhua Jia, Xiaofei Kang, and Ping Yao, eds.

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310 pages. ISBN 978-1-4384-5307-1

中國宗教與性別的研究，過去數十年來，自納入婦女為題開始，到擴展為具有性別意識的探討，從無至有，時有學者投注心力與熱情，成果亦精彩互見。¹ 然而，相較於既有的政治史、思想史或社會史等領域的熱絡對話，仍有長足的發展空間。書序開頭就指出，儘管 Joan Scott 在 1986 年早已倡言

2016 年 8 月 23 日收稿，2016 年 8 月 31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9 月 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Lin Hsiny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本篇書評承蒙審查者用心審閱並提供補充資料，謹此致謝。

- 1 中國宗教與性別領域的整體研究回顧，近年出版具代表性者，可參考管佩達（Beata Grant）在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該刊 2008 年所主編的兩卷號。他在卷首提供了領域的完整回顧，並在卷一最後提供了中文與歐美二手研究書目。不過這兩卷號的論文以帝制時期為主，不包含當代中國。當代部分，如本書序中所言，研究更為缺乏。康笑菲最近一文，提供了較完整的領域概況，兼具歷史考察和學術回顧，見 Kang Xiaofei, “Women and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in Vincent Goossaert et. al.,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1915* (Leiden: Brill, 2016), vol. 1, pp. 491-559.

將「性別做為歷史分析的重要範疇」，但近二十年後，Ursula King 仍在文章中大嘆「宗教研究中普遍的性別盲」和「性別研究中普遍的宗教盲」。這本論文集的面世，從澳門大學在 2011 年舉辦「女性及性別與中國宗教國際研討會」肇始，到 2014 年集結出版，所欲回應的便是上述雙重盲點，力圖以性別為核心範疇，聚焦探討中國宗教裡女性的宗教經驗、宗教角色，乃至文本中對性別化身體和性的論述。

中國宗教與性別研究的領域中，西文專書和期刊論文較多，但罕有以此為題、集結學者代表性作品的論文集，本書出版可說彌補此缺。目前已見幾篇英文書評，但未見中文介紹，藉此之便，筆者也提出所思，與學界交流。²

整體而言，本書從理論框架、課題選取、材料解析到編纂上具備不少優點。首先，序言以極具性別意識的視角，清晰梳理領域發展、回顧相關成果，展望未來的問題與方向。編者指出，本書受惠於宗教研究與中國研究兩方面的典範轉移，欲扭轉男性中心之敘事，發掘女性宗教經驗，並挑戰中國婦女做為受壓迫者的既定觀點。接著，扼要介紹佛教、道教、民間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乃至當代中國宗教復興下的相關婦女信仰和性別研究。本書一反常見以時代、地域或不同宗教傳統來組織的編排方式，而從性別所具之三重意涵來架構此書，分別從婦女自身（gender as women）、性別象徵（gender as symbolic views）和性別化的身體（gender as bodies）等三大主軸切入，使得理論和具體研究間的對話得以彰顯，亦便於讀者省思理論方法與自身研究之間的可能關係。再者，本書所收論文，涵蓋不同時代、地域、主題及宗教傳統，在學科類別與方法取徑上可謂多元，論文間亦不乏呼應對話。讀者於此書原有架構外，仍可依各自關注學科或主題，重新思索不同研究間的關聯。最後，本書囊括的學者，來自不同世代和地域，各自呈現多年研究心血結晶。

2 英文書評目前所見有三篇：Louis Komjathy, *Nan Nü* 17.2(2015): 360-364; Paul R. Katz,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015.7): 283-287 和 Jessey J. C. Choo,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3.2(2015.11): 206-208。三人各自提出一些精采問題，例如 Louis Komjathy 認為各篇理論與材料之整合仍待加強、對男性性別建構之探討不夠細膩。Paul Katz 指出本書對民間宗教討論極少，全書仍以組織型宗教為主。此外，對性別論述本身探討得多，但對這些論述如何納入政治與社會權力的框架分析得少。Jessey Choo 肯定各篇論文所用材料之獨特性，足以彰顯女性的宗教經驗與主體性，但對「性別」差異和互動的討論仍顯著少於「婦女」本身。

凡此編排上的剪裁和用心，皆使本論文集可讀性極高，不僅可做為絕佳的領域入門教材，也是有志耕耘相關課題者的必讀書籍，值得學者在相關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對話。

論文集分為三大部分，依次環繞上述性別的三重意涵展開探討，每部分三篇論文，然各篇未必僅止於處理該部分主題，讀者亦可從其他兩重意涵自行延伸思考。第一部分「重現女性宗教經驗與主體性」，以還原女性自身經驗與聲音來定義性別，透過新材料的挖掘，凸顯以往歷史和宗教中隱微不顯的女性宗教經驗和主體參與。第一篇「佛教式的孝道：唐代婦女及其參與之轉變」，作者姚平（Ping Yao）觀察到，中古各類佛教碑記中，特別是唐代的灰身塔和石浮圖中，包含大量出家和在家女性的姓名。他們為往生父母起塔或造像，以表孝道。中土女性參與此類實踐的數量和比例實遠勝於印度女性和同時代的中土男性。此外，女兒被呈現為佛教孝道的積極實踐者。對此，作者也提出一些有趣解釋，例如在家僧尼與本家的緊密連結，對儒家士人來說頌揚出家女兒的佛教式孝道，比起解釋男性出家更加方便且不違禮俗，以及在士族家庭中相較於兒子、更多女兒進入教團，使得女性的佛教式孝道實踐更常受到討論等等。此外，這類佛教碑銘不時透露母親對子女佛教信仰的巨大影響，以及女兒與母親的緊密情感連結。唐代在家和出家女性在中土佛教式孝道表達的演變上，實具重要作用。

第二篇「寫入傳統：臨濟禪師季總行徹（b. 1606）的自傳性宣講」，管佩達（Beata Grant）細緻解讀此位女性禪師留下的自道之語。他發現，季總行徹的自我描繪大致遵循同代男性禪師立下的傳統書寫模式，但亦有細微調整，以期確立其宣法傳法的權威，而當中不少微調即反映在禪師自我的性別表述。例如偶因身為女性而有自認權威不足的自謙之詞，或自言乃老僧投胎轉世，或不曾提起所生子女，卻經常言及自身閱讀與宗教追尋的愛好傾向，對於當時盛行於寡婦間的念佛修行亦不採納，而偏好禪修等等。季總可說相當程度地揚棄女性身分和角色。而他在文學上的才華和其宗教自我間，亦有著時而緊張、時而相輔相成的關係。季總的案例顯示，宗教理想下以男性為典範的身體觀與女性修行者自我認知間，常有各種複雜關係，而這也反映在後面第三部分的兩篇論文中。

第三篇「創造宗教、創造新女性：蘇雪林自傳性小說《棘心》」透過這位

小說家的自傳創作來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如季總禪師之例所示，女性的宗教自傳書寫如何用來建構其宗教經驗和主體性？二是當代中國的宗教敘事又如何深受女性經驗之外對「新女性」論述的影響？作者倪湛舸（Zhange Ni）指出，《棘心》反映蘇雪林對其天主教信仰、國族情懷、共產主義和女性意識之間相互關係的思考。過去共產黨和天主教文藝評論者常忽略小說中對女性連結和情誼的強調，或貶之為閨閣文學，但深究之下實可發現，蘇雪林不只在女性情感連結的基礎上賦予家國一種新的想像，也為這種新想像注入宗教情感。二十世紀初正值重新定位國家與宗教關係之際，宗教一詞亦首度引入新中國，對其內涵與界定，眾說紛紜。《棘心》將宗教定義為濃烈的情感，並以「宗教與愛情」的主題挑戰既有文學潮流裡慣常出現的「革命與愛情」主題。女性以其濃烈情感轉向宗教追求和與其他女性之間的情誼，而非用於奉獻新中國之建立，在國族主義者看來或許是背叛，但作者強調，在此歷史過程中，不只男性，女性如蘇雪林，也參與了何為「宗教」的內涵界定。

本書第二部分為「重新定義宗教認同與傳統」，分析宗教中女性受到評判的性別觀點和論述，指出當中的宗教象徵，以及經常與意識型態和政治糾葛的宗教生活，藉此理解女性宗教活動在公領域中的特徵、重要性和與男性的互動。第四篇「唐代女道士的身分認同」一文中，賈晉華（Jinhua Jia）首先反思學者研究唐代女道時多不加區別地指稱其為「妓」的現象，甚至為女道及其作品貼上「淫蕩」或「靡弱」等負面標籤。與此相反，賈晉華主張，應當將宗教與詩文視為女性藉以自我表達、展現行動的兩種途徑，重新審視唐代女道的自我實踐。他也進一步分析女道士獲取其地位和社會文化空間的幾項時空背景和要素：首先是道教內部有房中合氣和男女情愛關係的傳統，儘管迭遭批評與清整，唐詩中仍保留不少詩人和女真、女道親密往來的詩句。唐代文人的女神崇拜亦留下不少詩作。此類崇拜延伸至女道，他們熟知此一文化脈絡，亦厚植學養，善用相關典故，藉此獲取情愛或社會文化資源。女道更多半具有良好教養，亦有相對獨立的社經地位，自有田產、居所，有別於依靠技藝為生的妓。後者在收入和人身自由上無法自主，而前者卻擁有自主追求情愛的自由。

宗教符號、象徵雖能成為女性堪以援用的資源，有時也成為政治動員的素材。康笑菲（Xiaofei Kang）在第五篇論文「重探白毛女：共產黨革命宣傳

中的婦女、性別和宗教」中，探討 1940 年代共產黨利用性別化語言重新包裝傳統宗教符號，以達成群眾動員的目的。宣傳劇中，白毛女象徵陰性化和被犧牲的農民階級和中國，深受「封建迷信」所害，身為共產黨士兵的情人挺身而出，予以解救。該劇把傳統宗教視為共產黨爭取群眾信仰的主要對手，意在用全知全能的共產主義理想來取代傳統宗教。策略則是運用農村中熟悉的性別化語言和意象：女性做為受害者被動等待拯救，這一拯救又放在階級鬥爭的語言中，象徵農民對傳統宗教和政治勢力的集體拒絕，以及其後對黨領導的轉向與順服。劇中此類符號在在深化了女性做為革命利益接受者的形象，而非主導的革命行動者。

第六篇論文「徘徊於兩種父權體制之間：後殖民香港的中國基督教婦女」，黃慧貞（Wai Ching Angela Wong）訪談香港四十位女性信徒，檢視在中西交會的香港，同時面對中式父權體制和基督教的父權傳統，他們如何各以不同策略詮釋兩者，或汲取力量，或出走反抗。他問道，基督教是否只是以另一種父權替代傳統的中式父權呢？基督教傳入香港之初，雖以其引入西方先進觀念的形象示人，但也帶來鼓吹女性順服、以丈夫為首並留在家庭中的觀念。訪談顯示，光譜上存在著多元案例，有的女性繼續恪守傳統，有的則突破與恪守並存，也有出走他途、繞道回歸，最終重新定位自我者。本文最值得肯定之處在於，文章不只呈現女性在體制內與之互動的樣態，也探索體制的裂隙與缺口。訪談包含四名分別為離婚、同志與跨性別的女性，呈現他們在傳統婚姻家庭觀念下受挫或無處容身之際，如何肯定自我經驗，重建身分認同，進而挑戰並重新詮釋基督教的父權傳統。

論文集的第三部分「發現身體差異」探討性別的第三重意涵：性別化的身體差異、展現和主體性。過去三十年來，學者日漸重視宗教論述和實踐如何對身體及其差異賦予各種意涵；文化對性別化身體的論述又如何影響儀式、宗教位階和職務。近來宗教理論亦關注身體的主體性——身體經驗和信仰如何經由宗教實踐而被轉化、建構。第七篇論文「孕育自我：中古道教裡的隱喻與轉化」中，李福（Gil Raz）即由道教追求長生修行當中的胎產論述來揭示其身體觀。道教認為，俗世經由女性所孕育誕生之人皆帶有「胎結」（或結節），除非「解結」，否則不能免於一死。這類經典以男性修道者為預設讀者，鼓勵存想其體內陰陽二元的身中神，在兩者結合後，鍊化內胎，扭轉

俗世生產帶來的必死之結，誕孕新生自我。以往已有學者主張，道教的理想身體是陰陽同體，甚至是抹除性別差異的；對此，作者不無批判地指出，道教提供男性修道者想像一個以陰陽二元自足循環產生能量的身體，其修行將身體轉化為涵攝陰陽兩性能量，且得以自行超越重生並優於俗世性別化的身體。道教雖頌揚陰性的創造力量，修行上卻排拒實際的女性身體，否定母親生育的價值。

道教的性別身體觀及其對實際女性身體的否定也是第八篇論文的主題。阿琳那（Elena Valussi）於「女丹：一個性別化身體的發展和轉化」一文，討論出現於十七世紀，並在十九、二十世紀得到發展的女丹。這類文獻旨在教導女性修鍊內丹。其成立原由，作者認為，與其說提供女性專屬的修丹文類，或為因應女性熱絡修道而生，不如說是為了將女性的修道空間局限於家內，避免接觸男性而建立的類別。作者細讀男性作者的書序，發現當中經常表達女性拋頭露面進行宗教活動，容易誤入歧途的擔憂，而女丹不僅「安全且易入手」，更適於婦女於完成家庭職責後再行修習。再者，女丹書中對女性身體及其天性的說法也進一步強化既定的女性身體觀：女性以血為主，經血流失導致虛冷，故治療以補血，促使流動和防止凝滯為主。以此為前提，女丹修鍊也以斬斷經血，防止其繼續在月經、生育和哺乳中散失為主。女丹書更預設女性「性情易蕩」，難以掌控自身情欲，易影響修行，而修行女丹則有助「剝盡群陰」，去除各種女性特徵，轉女體為男形，並能「幽閒真靜養性情，婦道克全德匪輕」。女丹書以「大丈夫」一詞來描述成道的女丹修鍊者。換言之，男性的身體形象仍是修道的終極理想。女丹書與其說賦予女性資源，提高其力量，不如說加強女性汙穢的觀念，並告誡婦女侵入男性主導之社會空間的危險。

宗教與社會文化中負面的女性身體觀深入人心，但當中未必全無是處。最後一篇論文「更年期的宗教儀式：轉變中的身體、認同和價值觀」，張德貞（Neky Tak-ching Cheung）就從佛教的接珠儀式探討宗教生命儀禮如何給予更年期後的婦女安頓生命的力量。該儀式盛行於中國東南的客家族群，婦女在絕經後，經此儀式接受佛珠，既是過渡，也是開啓迎接下一生命階段的到來。當地婦女相信若不經此儀式，則此後頌念佛號無效，難以往生淨土，更會落入地獄，投生為牛馬。儀式過程強調女性在父系社會中的從屬地位，重申婦

女產孕汙穢，不得以女身成佛的既有觀念，但也肯定女性在此架構下為妻為母、有夫有子的圓滿、完成人生前一階段的辛勞，頌揚此一理想。儀式中婆婆與媳婦間的接珠傳遞，母親和出嫁女兒間的禮物餽贈，則凝聚不同世代婦女間的情感連結。鄉村年長婦女藉創造、進行和傳遞此儀式來整合儒家家庭價值，對潔淨的民間信仰，和佛教的誦念修行，也凝聚情感，在肯定既有架構下，也展現其行動力量。

整體來說，這九篇文章，將宗教視為既存的權力框架，卻也是女性得以從中汲取資源、展現行動的基礎。作者們從不同的時代和城鄉地域，應用文獻或出土材料、訪談或田野調查等多元方法，突破傳統女性留下較少文字與自我聲音的限制，呈現女性如何運用宗教資源，增強自身文化社會資本，更探討性別化的宗教論述如何參與建構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的框架。然各篇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思辯之處。首先，宗教與性別的研究似易忽略經濟階層與財產的問題。全書除賈晉華論及女道的經濟來源和地位外，其他均無涉及此面向。但女性在追尋宗教理想、表達自我願望之際，或宗教論述當中的各種性別身體想像，背後反映或支撐的女性經濟與財產條件為何？例如，中古時代大量女性建造佛教碑塔以表孝道，這是否能反映他們對財產的支配或擁有權？³ 選擇恪守或挑戰中式與基督教父權體制的不同女性受訪者之間，經濟因素是否左右其抉擇？接珠儀式在不同階層婦女間的施行有無變異？⁴ 第二，部分材料與作者的解讀之間，或有可再商榷之處。例如李福提到上清道

3 過去學者探討中古佛教造像、碑記和寺院活動時，已注意到此類活動與地方社群或家族之經濟連結。如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2.9): 497-544；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Stanley Abe,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等。此外，目前討論中古女性的財產權，多利用正史、禮制與律令材料，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女性財產權試探〉，《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191-238。佛教造像碑銘或敦煌寺社文書中的婦女姓名或捐獻紀錄，尚未受到廣泛利用，藉以討論女性在佛教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參與和背後反映之財產權。

4 作者專著有較詳細討論，見Neky Tak-ching Cheung, *Women's Ritual in China: Jiezhu (Receiving Buddhist Prayer Beads) Performed by Menopausal Women in Ninghua, Western Fujian*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int, 2008).

經以「逆轉」、否定世俗胎產生育的過程，重新鍊化新胎，誕孕不死自我，其用詞「reversing」(p. 197) 或標題「reversing gestation」(p. 193) 易使人聯想為十月懷胎過程的逆轉，但作者所引史料中，卻無此類逆反懷胎的描述或暗示。此外，對胎結的產生，史料似非只歸咎母親一方，而是父母兼提，能否直接等同為否定母親生育，或可再斟酌。⁵ 最後，張德貞主張接珠儀式具有幫助絕經後婦女邁入下一生命階段的安定力量，展現年長婦女在既有架構局限下的能動性；然全文傾向呈現儀式完整過程，著墨於儀式的結構和規則本身；受訪案例較少涉及無法達成儀式要求或產生衝突、斷裂的人事物。譬如，不婚、離婚或先生、子女早逝的女性，其自身或周遭親友又如何看待或經歷此類儀式？他們如何調和儀式裡頌揚的傳統女性理想和自我生命經驗的落差？進一步來說，研究者在探討既存性別框架和論述之際，對於結構及其斷裂、衝突的一面，這兩端之間的呈現又應如何平衡與取捨？

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誠如序中所言，涉及的是我們如何定義「宗教」和「性別」，而這兩個概念本身即存在多元且流動的內涵。本書由此出發，清晰標舉其界定，亦帶領讀者一覽各家學者從不同學科、方法和課題中所開展而出的討論。然而，宗教除了作為權力結構和可取用的資源外，是否仍有其他切入角度？性別除了婦女自身、性別象徵和身體差異等面向外，一如本書所示，其實更普遍地體現於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或對自我、他者乃至年齡、階級與族群的再現中。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些課題，將會如何改變我們以往認識的中國宗教？展閱此書，異次元玫瑰已見處處綻放，然而故事才正要展開。

5 如作者於頁 193 所引史料提到「天地交運，二象合真。陰陽降氣……化為人身，含胎養育」，或頁 197「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也，而不覺帝君五神來適於期間也。」兩則皆顯示文獻脈絡承認父母雙方共同孕育世俗凡胎。